

重新认识张载的历史地位

□ 刘沛恩

张载，字子厚，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关学”的创始人，世人称之为“横渠先生”。史学界对张载的思想及历史地位有着不同认识。今天，我们站在战略哲学的角度，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张载的伟大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子厚生于长安。青年时交好范仲淹，研读儒家六经。进士及第，拜祁州司法参军，授云岩县令，迁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郎。辞官归家后讲学于关中，建立“关学”学派。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子厚病逝于临潼，时年58岁，世人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留世，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赅，历代传颂不衰。

张载继承西周天人合德思想，首次提出“性与天道合一”的战略伦理学思想。“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周人提出“德”的观念，把殷人的“以祖配天”发展成“以德配天”，以德来解释殷周鼎革的正当性。后世不同派别对此问题众说纷纭，而张载是第一个明确指出“性与天道合一”的大儒。他从“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正蒙·太和》写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气有两种状态，气散是无形的太虚，气聚则为有形的万物，所以人与自然万物皆“与气同构”“太虚即气”。张载思想中对天的认识归结为：“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从天的自然



北宋大儒张载

义中引申出天的“德性”义。天本无心，人具有天心，所以可以秉承天德。“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张载之“天”，由形转化成理，从理又转化成德，最后回归到德性，将“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万物相感”的天道观，这是北宋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一环。《西铭》所提及的“民胞物与”标志着张载“天人合一”学说的最终形成，这不仅是对儒家经典的传承，对儒家思想精髓的总结，更是儒学进行的一次伟大创新。

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战略伦理情怀。《西铭》篇中，张载把天地宇宙万物看作一体，人类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自然界万物是我们的同类：“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将其“性与天道合一”的思想创建推向伦理思想阐发的高峰。张载第一次将父母、夫妇、君臣、长幼、朋友的五伦关系合而为一，将五伦统归为宗族这一

关系：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的管家，尊敬年长者就是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的人就是保护同胞中的幼弱之属。世人说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相合的人，贤人是其中优异之辈。天底下无论是衰老者、残疾人、孤苦无依之人、鳏夫寡妇，都是我身边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姐妹。张载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合一”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从社会伦理关系建构上完成了天道“厚德”“载物”精神在人道的贯彻落地。“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万物以有形的形体充塞天地，而我辈以顺天之“性”引领思想行为，承载和发扬“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

张载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战略伦理目标。“横渠四句”出自张载《横渠语录》，言简意宏，开显出北宋理学的浩然气象，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天地立心”，程明道说：

“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又说：“天地无心而成化。”人为天地立心，即能效法天成化万物之德，润物无声；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廓然大公，仁民爱物。“为生民立命”来源于孟子的“立命”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张载以人之“性”为天地之帅，倡导学者承载天德，修身立命，至于富贵还是贫贱，则顺事而安之。后世学者效法天心，学习古圣先贤立命之道，正是探索为往圣继绝学的方法，肩负起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

张载的思想不仅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奠基性、开创性地位，从整个儒家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张载的思想具有恢弘的思想气度、青出于蓝的创新精神和力挽狂澜的使命意义。在释家思想盛行、儒家思想日渐低迷的时代，张载通过对佛、道两家哲学观点的吸纳和批判，构建起他的儒学体系。他用“太虚即气”的命题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通过证明万物是“气化”而对佛、道两家的生死观进行吸收、批判。以天道观为基础，张载构建了人性论及与之相应的修养理论，以达到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茫茫宇宙之中，个体的人虽渺小，却是按照乾父坤母的天地孕生之道而生，所以每个人都秉承天地之道，都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提起张释之，现在一些人很可能不知其名，在汉初，他的名字可是如雷贯耳。张释之出身低微，靠捐纳做了小官，后来一步步升迁，最后做到廷尉。廷尉是天下九卿之一，掌刑狱，大致类似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他虽无周勃一般的征战和拥戴之功，却能始终做到对上不畏、对下不欺。《汉书》评论他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有三个故事最能说明张释之的“硬气”。张释之担任公车令时，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与梁王刘揖同乘一辆车入朝，按照官卫令，除皇帝乘坐的车舆，所有入皇宫的车辆，到了司马门都应该下车，但太子和梁王没有这样做。张释之疾步追上二人的车子，阻止他们进宫，并以“过司马门不下车为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太子和梁王。汉文帝替他们求情，张释之一点也不退让，汉文帝只得摘下帽子替儿子请罪，直到薄太后亲自下达特赦令，太子、梁王才得以进入宫中。

后来，汉文帝任命张释之做廷尉，张释之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但他并没有因为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而改变本色，更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判决案件依然严守法律。

某次汉文帝出巡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惊了拉车舆的马，文帝差点摔下来。汉文帝非常恼火，当即命侍卫抓了此人，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第一时间审问了肇事者，那人说：“我是长安乡下人，听说清道禁止人通行，就藏在桥下。过了很久，以为皇帝的车队已经走了，才从桥下出来，见到皇帝的车队正在经过，于是跑了起来。”张释之认为此人是无心之失，根据律令将肇事者判为“冒犯车驾，罚金四两”。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汉文帝很不满意，他说：“此人惊扰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性情温和，换了别的马，会不摔伤我吗？廷尉怎么只处以罚金呢？”张释之解释说：“法律是天子 and 百姓应该共同遵守的，不应偏私。法有定规，如果加重处罚，如何取信于民。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如果廷尉不公正，地方也会不公，百姓就会惶恐不安。”汉文帝思考了很久才说：“廷尉的量刑判决是对的。”

有一日，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被抓获，汉文帝十分恼怒，将罪犯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依法奏请文帝判处弃市。汉文帝大怒，说：“此人无法无天，居然敢盗先帝庙器，我将他交给你，是让你判处其灭族之罪的，而你只是按照法律的僵硬规定将其判处死刑，实在有违我敬奉先庙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帽头，叩首谢罪说：“这样依法治罪已经足



够了。况且罪名相当时，也要考虑犯罪情节的轻重。偷盗宗庙器物就要处以灭族之罪，今后万一有愚蠢的人挖长陵一捧土，陛下将用什么刑律判决呢？”案子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文帝与薄太后经过商量，终于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张释之能够在执法时硬气，并无任何作秀的意图，只是源于其一贯的刚正。有一次，汉文帝在登霸陵时生死后以北山之石为槨、以苳麻塞缝、再用漆水沾涂其上的想法，左右都称善，只有张释之直言劝谏：“使其中有可欲者，虽固南山犹有郤；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槨，又何戚焉！”他的言下之意其实是希望汉文帝死后不要在坟墓里放太多珍贵的东西，不要为保住珍宝制作特别费功夫的棺槨，以免助长大兴土木之风。汉文帝听从他的意见，放弃了最初打算。

一个人既然如此刚正，做一般的行政官员，他会悲悯苍生；做司法官员，他会恪守法律。任何的“硬气”，本质上都是与纯净的操守联系在一起的。



“百日宰相”杜衍

□ 刘立祥

杜衍（978—1057年），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名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观察推官、秘书省著作佐郎、平遥知县，此后在朝廷中枢和四方州军间频繁交替任职，在朝中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枢密使等职，庆历四年（1044年）拜相。杜衍为官素有能名，尤以善于治狱闻名朝野，一生宦海沉浮，退休后竟无屋可居，寓居于驿舍终其一生，令人为之钦慕不已。

少历磨难，流浪儿苦读登第

杜衍出身于官宦之家，其九世祖杜佑为唐朝名相；祖父杜叔詹，官至鸿胪卿，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吴国公；父亲杜遂良，任宋太宗朝尚书度支员外郎。这个富足的官宦之家本来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杜遂良在杜年突然暴病身亡，此时的杜衍尚在母腹之中。

母亲含悲生下杜衍，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改嫁河阳钱氏。杜衍在祖父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不幸的是在淳化四年（993年），杜衍15岁的时候，祖父也遽然撒手人寰。

祖父去世不久，杜家爆发了家产大战。杜衍前母所生两个哥哥，指称杜衍的母亲改嫁带走了家族的钱财，气势汹汹地向杜衍索要，杜衍愤愤不平，双方发生冲突。小小年纪的杜衍哪里是两个哥哥的对手，被哥哥挥剑砍伤脑袋，鲜血直流。杜衍逃到姑母家，养好了伤，又前往河阳投奔母亲。

母子连心。看到儿子遭此劫难，母亲不由悲声大放，然而，继父却无论如何不肯收留杜衍。杜衍无奈，只好辞别母亲，孤身一人四处流浪。

处流浪。

昔日官宦之家的阔少，如今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天无绝人之路。或许是天悯英才，某日，杜衍流浪至济阳，遇到了当地富豪相里氏。相里氏见杜衍仪表不凡，不由眼前一亮，认定他必是一位奇伟之士，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供给他生活一应所需，资助他读书求学。从此，杜衍专心致志，悬梁刺股，刻苦攻读。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30岁的杜衍金榜题名，中进士甲科。

任职四方，能吏盛名震天下

杜衍进士及第后，被朝廷任命为扬州观察推官，不久，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平遥知县。此后，朝廷遣使者巡察平遥，因政绩突出，鼎力举荐，又擢升杜衍为晋州通判。

朝廷下诏令推举品质优良政绩卓异的官吏，杜衍名列其中，遂被擢升为乾州知州。后来，朝廷又调杜衍知凤翔府，因事遭罢免，“及罢归，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夺我贤太守也？’”

杜衍以公正明断、善于决狱而名满天下。据《宋史·杜衍列传》，杜衍以太常博士为河东路提点刑狱，巡察潞州时，铁面无私，澄清冤案，知州王曙因此写了《辨狱记》，以诚所属官吏。

石州知州高继升遭人诬陷，以勾结外族阴谋叛乱罪被逮捕拘押，高继升鸣冤无门，案子久拖不决。朝廷敕命杜衍主审此案，杜衍排除



重重干扰，明察秋毫，将诬告者绳之以法。

宁化军守将执法过于严苛，将罪不至死者定为死罪。杜衍反复调查核实，认为案情不实，量刑不当，加以改正。守将对杜衍的判决不满，上诉朝廷，朝廷诏令刑狱复审，当事人死里逃生。

杜衍决狱明镜高悬，公正高效，名声大振。天圣六年（1028年），擢升为刑部员外郎。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派使者巡察淮南，使者回到汴京，尚未开口禀报出使情况，刘太后就急不可耐地问使者杜衍最近怎么样，是否安康。使者连忙将杜衍的政绩向太后汇报，“太后叹曰：‘吾知之久矣’”。后来，杜衍调任河东转运副使、陕西转运使。

朝廷征召杜衍入朝任三司户部

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江陵府。

尚未赴任，恰遇河北军费匮乏，朝廷紧急调杜衍以工部郎中衔出任河北都转运使。他理财有方，不向老百姓征收任何赋税，想方设法很快解除了军费匮乏的危机。

此后，朝廷又召还杜衍，任命为枢密直学士。杜衍请求外任，诏命以右谏议大夫知天雄军。

虽在朝廷与各地之间穿梭般调动，职务频繁变换，杜衍都一身浩然正气，浑身铮铮铁骨，恪尽职守，刚正不阿，清廉如水，赢得吏民的敬畏和赞誉。可谓为官一任，振兴一方，政声满天下。

“百日宰相”，刚正不阿遭罢黜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改革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改革纲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

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仁宗降诏擢升杜衍为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衍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小人多不悦”。

庆历新政改革纲领的核心是改革吏治，而改革吏治的重中之重是抑制“侥幸”。所谓侥幸，即皇帝的“恩降”——对官吏的任命、升迁，绕过正常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诏，交由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奉旨落实。宋仁宗一方面堂而皇之地下诏要“明黜陟，抑侥幸”，一方面又抹不开情面，接受私人请托，不断地写

条子，批发乌纱。

可是杜衍也不含糊。一次，谏官欧阳修入朝进对，仁宗对他说：“外人都知道杜衍退还降恩诏旨的事吗？可是他们不知道，面对前来求恩降的人，朕每每都推说杜衍不同意而终止的，比杜衍所封还的还要多得多呢。”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力阻挠和疯狂反扑，使尽种种手段在仁宗面前诬陷和诋毁革新派。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老谋深算的夏竦使出阴招，给了革新派致命一击：命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编造革新派阴谋废黜仁宗另立新君的弥天大谎。字迹写得惟妙惟肖，达到乱真的境地，范仲淹、富弼等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惶惶不已。

新政受阻，仁宗被双方的相互攻讦搞得厌烦不已，被谗言弄得头昏脑涨，渐渐对推行新政失去了兴趣，对推行新政的骨干人物范仲淹、富弼等心生反感。而身为宰相的杜衍又处处庇护着他们，这使仁宗大为恼火。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即告失败，范仲淹、富弼等被贬出京师，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杜衍也被罢相，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杜衍居宰相之位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

请求致仕，宰相退休住驿舍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69岁的杜衍上疏朝廷，请求退休，遂

以太子少师致仕，累加至太子太师，封祁国公。从此闲居南京（今河南商丘），住在驿舍十年，直至逝世。

宋人朱或《萍洲可谈》记载的一则轶事，真实再现了杜衍的退休生活。

某日，河南府举行宴会，邀请杜衍出席。杜衍头戴居家便帽，身着土里土气的便装前往赴宴，端坐一隅，静默不语。有位本路的发运司管勾文字（官名）来到桌前，大家纷纷起立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这位小官僚少年得志，见大家如此热情，唯有旁边那位白胡子老头儿稳若泰山，屁股稳稳地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不由火冒三丈，厉声问：“足下以前官居何位？”杜衍依然埋着头，不动声色地轻声呢喃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这位小官僚顿时面红耳赤。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寓居驿舍十年的杜衍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仁宗闻讯，紧急派使者问医赐药，带着太医前往看望，尚未赶到，杜衍已溘然长逝。杜衍临终，诫其子要竭忠尽孝，丧事从简，收殓自己时只用一枕一席，以小墓矮坟薄葬，并留下遗嘱，“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语不及私。

杜衍一生宦海沉浮，任职四方，先后主政十几个州军，又在朝中任枢密使、宰相这样的顶级大员，刚正不阿，清廉如水，名震朝野，从不经营自己的“安乐窝”，退休后竟居无所归，不得不栖身驿舍，直至怆然离世，委实令人钦佩不已！

